

# 特朗普国家资本“混改”英特尔的全球冲击

近日，据媒体报道，美国政府将 89 亿美元补贴转换为英特尔 10% 股权，美国国防部还将收购有关承包商的股权，这一被媒体称为“特朗普混改”的操作，标志着“聪明”的美帝国主义正在探索一场国有化新思路。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做法，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效仿，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“做大做强”国有企业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8 月 22 日，美国商务部宣布以收购股权形式向英特尔提供 89 亿美元资助，这笔资金源自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尚未支付的 57 亿美元补贴和另一笔 32 亿美元政府资助。美国政府由此成为英特尔第二大股东，却精妙地将持股比例控制在 9.9%，避免成为需要承担更多监管责任的“主要股东”。

白宫经济顾问凯文·哈塞特直言，此举是创建“主权财富基金”的起点。这一操作不仅规避了直接财政拨款可能引发的“政府过度干预”质疑，更通过“被动所有权”设计保留关键决策权——若英特尔代工业务控股权旁落，政府有权额外增持 5% 股份。

## 一、从自由市场到国家资本的战略转型？

特朗普政府入股英特尔，绝非简单的财务投资。这一行动反映了美国产业政策的深层转变：从无偿补贴到股权参与，从市场放任到战略干预。

英特尔近年面临严峻挑战。技术方面，过去三年为追赶台积电

电投入 400 亿美元，但最先进的 18A 工艺（1.8 纳米）良率不足 70%；财务方面，2025 年第二季度净亏损 29 亿美元，过去五年投入超千亿美元却换来 15 万人的裁员和工厂出售。

地缘政治考量更为关键。全球 90% 的尖端芯片产自台积电，但台湾的地缘风险让美国如坐针毡。一位麻省理工学院专家点破关键：“若台积电工厂全搬来美国，我们为何还要保卫台湾？”

消息公布后，英特尔股价单日上涨 5.53%，总市值重回千亿美元。但比市场反应更重要的是战略意义——美国正通过股权控制重塑半导体产业链，确保“尖端芯片制造在美国本土”的战略目标。

## 二、资本主义政府重新审视企业国有化？

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并非新鲜事。二战后，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先后对电力、煤炭、钢铁等部门实行国有化；2008 年金融危机中，美国政府曾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。

但特朗普时代的“混改”呈现出新特征：

**从全面国有化到精准控股：**美国政府仅持有 9.9% 股份，避免成为“主要股东”以规避监管，同时通过权证设计保留对关键业务的控制权。

**从危机应对到战略主动：**不同于以往经济衰退时的被动救助，此次入股英特尔是在经济未现危机时主动布局，彰显“产业政策工具化”倾向。

**意识形态包装：**特朗普将此举称为“主权财富基金”建设，试

图淡化“国有化”标签，规避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评。

这种迭代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。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迫使资本所有制形式不断社会化。

### 三、多样化的国家干预模式

西方国家在国有企业经营方式上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形成了多种模式。

股份制经营在西方国家被广泛使用。国家作为股东持有股份，通过委派董事、董事长或与企业签订计划合同等措施对企业的发展方向、经营方针进行调控，但不干预日常经营和管理。

黄金股机制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。政府掌握着公司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中的“一票否决权”，但不参与企业分红和日常经营。

租赁经营模式：美国曾将合成橡胶工厂“出租”给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、海湾石油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等大公司经营，国家进行间接控制。

系统承包经营：美国政府对官私合营企业通常不采用部门管理方法，而是由政府作为产品计划的招标人，按照择优原则，选定一家或数家投标公司为主承包商。

新加坡的“淡马锡”模式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国企管理模式之一。淡马锡控股公司最初的投资组合总值仅为 3.54 亿新元，而在上一财年末，淡马锡的投资组合总值达到 2150 亿新元。

#### 四、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全球影响

美国对英特尔的“混改”正在引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连锁反应。

产业链碎片化加剧：美国通过控股英特尔强化本土芯片制造能力，可能促使欧盟、韩国等跟进。欧盟《芯片法案》已计划投入 430 亿欧元提升本土竞争力，形成“技术联盟”对抗。

技术竞争白热化：政府背书可能加速英特尔技术突破，但政治干预也可能削弱其市场化决策。美国可能要求英特尔优先满足国防需求，影响其在人工智能芯片等商业领域的布局。

国际规则面临考验：根据 WTO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》，政府股权投资若被认定为“专向性补贴”，可能引发贸易摩擦。美国通过转换既有补贴资金规避新财政拨款，但依然可能违反竞争中立原则。

管理效率挑战：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有化后，普遍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。英国国有化后的煤炭局、电力委员会等企业，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，依赖政府补贴。

#### 五、马克思主义与波兰尼的理论解释

从英国私有化浪潮到新加坡淡马锡模式，从法国计划合同制到德国“托管”改革，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探索国有资本的最佳运作方式。如今美国的“主权财富基金”实验，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探索增添了新注脚。

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，美国政府的“混改”本质上是生产关系

适应生产力的调整。半导体产业作为战略领域，其社会化生产需求与私有制矛盾的激化，迫使政府通过股权介入缓和危机。但这种调整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，反而可能孕育新的危机。

另一方面，根据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·波兰尼的“双向运动”理论，现代社会由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塑造：一是推动市场扩张、商品化的“自由市场运动”——半导体产业全球化；二是寻求社会保护、防止人和自然被商品化的“反向运动”——美国的产业链安全焦虑。当市场力量试图将土地、劳动力和货币全部变为商品时，必然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反应——这种反应往往通过政府干预、管制和国有化等形式表现。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，正是这种“反向运动”在数字时代的典型体现：面对芯片产业链全球化带来的安全脆弱性，政府通过股权干预实施“社会保护”。波兰尼的理论超越了传统“市场 vs 政府”的二元对立，揭示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中的本质特征，为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工具。

## 六、中国应对

特朗普的“混改”实验，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逆流中寻找新竞争模式的尝试。其短期效果可能提振美国半导体产业，但长期可能加剧全球产业链扭曲与规则冲突。

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新动向，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，推动高水平开放，方能在变局中把握主动，避免陷入“国有化-私有化”循环。

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:新自由主义思潮可能借机侵蚀国企改革成果,需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,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。参考新加坡淡马锡模式,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。

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安全:在半导体等领域,既要加大自主研发投入,也要通过开放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,避免“脱钩”风险。数据显示,中国中低端芯片自给率已达50%,正猛攻第三代半导体技术。

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:随着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,中国应主动参与制定新规则确保公平竞争,通过国际协调、国内改革等多种方式提升话语权。